

现·代·文·学·专·号

WENXUE
PINGLUN
CONGKAN

文学评论丛刊

第十一辑

现代文学专号

文学评论丛刊

第十一辑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学评论丛刊

第十一辑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¹/₂印张 265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00册

统一书号: 10190·082 定价: 1.30元

目 录

巴金与俄国文学	陈思和 李辉 (1)
大革命前后巴金的思想探索	艾晓明 (29)
散论巴金的散文创作	顾 炯 (53)
组织戏剧冲突的杰出本领	辛宪锡 (76)
——曹禺编剧技巧研究之一	
真挚的诗情,沉郁的格调	高 鑫 杜元明 (93)
——评荒煤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瞿秋白诗歌初探	冒 忻 (114)
论鲁彦散文的创作特色	沈斯亨 (136)
萧军的文学道路	徐 塞 (159)
试论《老张的哲学》	佟家桓 (186)
海滩上的花	胡凌芝 (200)
——评徐志摩的“理想主义”	
“五四”时期小说批评概述	吴福辉 (223)

评“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主张朱德发 (250)

苦闷的“象征”李国涛 (294)

——《野草》艺术谈

与理解“狂人”形象有关的两个问题张惠仁 (309)

——公兰谷遗作《论〈狂人日记〉》读后

鲁迅与瞿秋白的杂文比较张梦阳 (323)

资 | 关于郭沫若生平活动的几点考订...易明善 (345)

巴金的第一篇散文创作岑 光 (363)

料 | 蒋光慈赴苏留学和归国的时间张惠达 (185)

巴金与俄国文学

陈思和李辉

巴金是我国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与其他同时代的著名作家一样，他的深厚的艺术修养不仅来自于本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以及现实生活环境，同时还吸取了大量外国文学的养料，形成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道路和创作风格。一九七九年，巴金在法国访问时，曾告诉那儿的朋友说：“在所有中国作家之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①在这些西方文学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要算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仅就翻译而言，巴金翻译了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人的文艺作品和一些社会科学著作。在他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期间，主编出版了整套的《契诃夫戏剧集》《屠格涅夫选集》《冈察洛夫全集》等等，俄国文学作品的出版数字占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出的外国文学作品总数的一半左右。从巴金的文学创作来看，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试图就俄国文学对巴金文学创作的影响作出简单的论述。

—

接受俄国文学的影响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① 引自黎海宁译《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香港《大公报》1979年7月1—2日。

性质所决定的。诚如冯雪峰同志所指出的：“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社会性质和状况和处在民主革命中的中国社会有那样大的近似，俄罗斯人民的丰富的革命历史以及精辟和英勇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又是那样地启发和激动着中国的人民，于是，再加上俄罗斯文学的特色，俄罗斯文学这就比任何别的文学更抓住中国人民的心灵”。^①由于这个原因，“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许多著名作家，都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出发，在俄国文学中吸取斗争的力量和武器。巴金正是在反抗封建专制制度，追求个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斗争中，被反映俄国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民意党人反沙皇斗争事迹的文学传记和创作深深吸引住的。可以说，巴金的社会理想和信仰的确立，跟他对民意党人的敬仰是分不开的。早在十五岁那年，他读了两本使他“找到了终身事业”的小册子，一本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还有一本是波兰作家廖抗夫写的剧本《夜未央》。这个剧本就是描写了俄国民粹派革命者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流血和牺牲。巴金声称，他从剧本中看到了“万人享乐的新社会就会与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这以后，巴金又陆续读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皮沙烈夫、拉甫洛夫、涅克拉索夫等民主主义革命战士的作品，以及斯捷普尼雅克、妃格念尔、克鲁泡特金等民意党人和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传记，对俄国十九世纪反沙皇专制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俄国的民粹派运动，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俄国平民知识分子领导的一个革命运动，民粹派以车——杜事业的继承者自居，进行反沙皇专制，追求解放的斗争。他们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有许多错误，但他们对沙皇专制的反抗，对农奴制度的攻击，在俄国革命发展史上还是起到一定进步作用。他们不畏强暴，

^① 《鲁迅的文学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4页。

百折不挠,勇于献身的精神,曾激励着俄国人民起来同沙皇专制进行斗争。列宁曾经指出:“从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民粹派的理论是荒谬的,反动的,但是在反对农奴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斗争中,它却是合理的(就特定的历史任务来说)和进步的。”^①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特定环境中,巴金作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意党人的事迹对他产生很大的引诱力。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民粹派运动的历史以及与整个俄国社会运动的联系,陆续编写了《俄罗斯十女杰》《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断头台上》等小册子或文章。一九二八年他准备编写《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写了原计划的五分之一,后因创作小说而中断,一九三五年,他就将这前十章汇编成册,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从拉辛和普加乔夫的农民起义,一直写到民粹派的初步掀起,其中详细论述了十二月党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皮沙烈夫等人的革命活动。这些著作都可以看出巴金对俄国政治历史的研究花过很大的功夫,在材料的收集和论述上颇见功力。

巴金这本《俄国社会运动史话》的写作,很受到俄国斯捷普尼雅克的著作的影响。斯捷普尼雅克是民粹派著名的活动家,因一八七八年暗杀圣彼得堡宪兵司令后流亡国外,撰写了许多民意党英雄的特写,特别是《地底下的俄罗斯》一书,在西欧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巴金在一九二六年就读到这书的日译本,后来在巴黎又先后通过西班牙文、英文、法文三种译本对照读了几遍,他说他“被书的文笔和事实感动到了极点。”随后他又阅读了斯捷普尼雅克著的《沙皇政治与革命》《沙皇治下的俄罗斯》《一个虚无党人的生涯》等著作,并且将《地底下的俄罗斯》译为中

^①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218页。

文，一九二九年由上海益智书局出版，一九三六年巴金将它改名为《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新出版。

在研究俄国政治历史的过程中，巴金也同时接触了俄罗斯十九世纪的优秀文学。那些迅速反映人生的艺术画面，作家深厚的人道主义感情和充满正义的抗议声音，强烈地打动了巴金。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编写俄国社会历史小册子的同时，他又翻译了俄罗斯的民歌《凡尔加底岩石之上》、《普希金安慰十二月党人的诗和答诗》、赫尔岑的回忆录《母亲之死》，并撰写了《巧尔尼雪夫斯基论》。对车尔雪尼夫斯基的名著《怎么办》，巴金作过很高的评价，并曾经打算翻译，后因写《灭亡》没有完成，一九三六年他又请女作家罗淑将它节译出来，以《何为》的名字编入《文化生活丛刊》。在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巴金成为一个著名作家，但他在创作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翻译和介绍俄国文学。

巴金这些介绍和翻译俄罗斯文学的活动，与整个五四新文学的倾向是相一致的。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寻找中国出路的眼光转向北方。他们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从俄罗斯文学武库中寻取自己所需要的武器。左翼运动掀起后，以鲁迅、瞿秋白、茅盾为首的革命作家更是热心介绍、翻译苏联与旧俄文学，使其逐渐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文学潮流。但是，我们从巴金的翻译活动中可以看到，他对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既有同左翼文化运动相通的一面，又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政治与美学的标准。这些标准决定了他对俄国文学的爱好与取舍，既不同于一般的左翼作家，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主主义作家。

巴金同一般左翼作家的不同点，表现在对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由于政治上的误解，巴金很少介绍翻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作家与作品。可以以高尔基为例，三十年代

的中国文坛上，高尔基已被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化的奠基人，对他的介绍和研究，常常是与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介绍联系在一起的，而巴金对高尔基的介绍，则比较多的是偏重于高尔基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巴金翻译过高尔基的《草原故事》等小说，这些作品主要体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力量，与巴金早期的小说也颇接近。如他的短篇小说《五十多个》，描写一群灾民寻找光明和出路，与高尔基笔下的流浪者故事十分相似。另外，巴金与一般民主主义作家也有不同之处。五四时期，许多作家带着个人主义或追求个性解放的朦胧反抗意识去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我们扩大些范围来看，在五四时期，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青年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而奇怪的是，这些影响我们在巴金的作品中很少看到。歌德曾被作为“纯艺术”的作家排斥过，易卜生的著作，只是在他的《家》中与胡适的《终身大事》放在一起提到过几次，作为新思潮的一种表现，但作家并没有热情地介绍过其中的思想。这也许跟巴金的思想性格有关，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巴金的思想实质仍带有个人主义的痕迹，但他有鲜明的政治理想，他在当时所追求的是消灭一切阶级，人人平等自由的安那其社会理想，并坚信这一理想一定会实现。所以他的追求个性解放是比较积极的，能够自觉地将个性解放同反抗封建专制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从这一点看，维特式的消极反抗和娜拉式的孤独出走远不如俄国革命青年把追求个性解放视作为投身于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富有吸引力。所以巴金所喜欢、研究的俄国文学的范围，具有十分明显的倾向性。

他的独特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就是把俄国文学的介绍，看作是他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立场出发的，向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猛烈进攻的一种战斗武器。在整个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巴金始终以他独特的方式在探索和追求着革命的出路，这种追求使他用战斗者的眼光去取舍选择俄国文学作品。他喜欢描写俄国民主革命者的故事，尽管民意党人的传记文学在文学上价值并不很大，可是在他看来，这些作品不是古董，而是活人的血写成的，他喜欢它们。从文学方面看，巴金比较接近的作家如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阿尔志跋绥夫、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接触或反映了俄国民主革命，部分地反映了革命者的战斗生活；而对于同样是优秀的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和莱蒙托夫，他们的创作主要是揭露沙皇官僚地主的丑恶和描绘“多余人”的形象，对民主革命的状况反映不多，因此对巴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另一个著名作家契诃夫，他对巴金早期非但没有什么影响，甚至还引起过某些反感。巴金说过，他在还不到二十岁时，第一次接触契诃夫的作品，几乎弄不清作者在讲些什么，以后逐渐懂得契诃夫了，但对他笔下的小人物还是不感兴趣，因为契诃夫写的是“人性的失败”，那种顺从，厌世的性格，是跟巴金早期作品中热衷反抗的英雄格格不入的。^①

不仅在对俄国作家的选择取舍上巴金流露出如此鲜明的政治和艺术标准，而且对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的选择和取舍，巴金也是从这一标准出发的。普希金是俄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其他优秀抒情诗无论对俄国文学还是

① 巴金对契诃夫的这种感情，似乎跟民意党人对契诃夫的感情是相通的。民意党人妃格念尔在她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中也说过，她在监狱中读了契诃夫的小说后，大声疾呼：“难道生活真的是这么无聊，不活动，死一般的吗？”巴金直到抗战后期，风格才逐渐与契诃夫接近。解放后，他写过一本小册子《论契诃夫》，对这位俄罗斯作家作了专门的介绍和评论。

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可是巴金从来没有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这位诗人。他翻译了薄薄的一本普希金的诗歌《叛逆者之歌》，这首诗正是歌咏十二月党人的。陀思妥也夫斯基，虽然被巴金称之为比较喜欢的作家，但他作品中所反映的那种畸形、病态的人性，那种对顺从、忍耐等宗教理论的宣扬以及大段心理描写的表现手法，对巴金的创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巴金在一篇评论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之势力》的文章，曾提到过陀氏的《罪与罚》与《加拉马左夫弟兄》，主要是称赞作品中自愿跟随爱人去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女主人公。这些形象似乎与涅克拉索夫诗中民粹派革命家的妻子形象有某种相同之处，巴金显然是从这一点上对陀氏表示了赞赏。

托尔斯泰的无与伦比的伟大著作《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巴金几乎没有提到过，使他感兴趣是《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赎罪思想。我们不知道巴金是否读过拉甫洛夫的《历史书简》，但从他关于拉甫洛夫的论述中，可以肯定他是知道《历史书简》中关于知识分子向人民负下一笔债的思想对俄国进步青年产生过很大影响的。^①而《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活动，正是具体地体现了一种真诚的赎罪思想。这种思想，很容易使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又真诚向往革命的知识青年巴金引起共鸣。巴金自己宣称，他的《家》是受了《复活》的影响，在觉慧等人身上，强烈体现出“为上辈赎罪”的思想意识。在《灭亡》中，李冷兄妹

① 巴金在《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中论述了拉甫洛夫的《历史书简》：“在这些书简中，拉甫洛夫便成了一代青年的导师。他教导青年说，他们对于人民所应尽的义务是很重的，他们在受教育时代，在大学读书的年岁里的生活是完全靠着贫苦阶级来维持的，所以他们现在应该来帮助人，报答人民。”巴金的“为上辈赎罪”的思想与拉甫洛夫、托尔斯泰的思想都不完全一致，但受到后两者的影响是肯定的。

身上也体现出类似的思想。^①

屠格涅夫是巴金最喜欢也是最接近的作家之一，这位自由主义作家的思想经历过前进，停滞，甚至危机的复杂变化。从巴金翻译的二本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来看，一部是《父与子》，一部是《处女地》，这两部小说的内容都是同十九世纪民主革命有密切关系的。巴金也翻译过屠格涅夫一些优美的短篇和散文诗，以《散文诗》一书为例，这是反映作家晚期思想比较消极复杂的一部著作，但从巴金对这个集子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最欣赏的是其中两篇，一篇是充满爱国主义思想激情的《俄罗斯语言》，一篇是歌颂女革命者的《门槛》。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金翻译、介绍俄国文学的政治标准与审美趣味，这不仅使我们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巴金翻译俄国文学的思想动机，也能够比较真切地了解，为什么在巴金的创作中有许多地方同俄国文学有如此的相象。

二

由于巴金从战斗的反封建反专制的要求出发，对俄国十九世纪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怀着浓厚的兴趣和赞赏态度，对俄国政治历史以及文学作了深入的研究、介绍和翻译，这就使他不能不受到俄国历史和文学的极大影响。这些影响自然而然地在巴金的创作中流露出来。当我们读着巴金早期的许多小说时，都会发现俄国的文学对他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在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与情节的描写上都有十分相似的地方。

① 《灭亡》中李冷兄妹有一段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这些相似之处，首先是来自俄国民主革命者的英雄事迹。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俄国的民粹派的英雄事迹几乎跟无政府主义同时吸引着巴金，后者给了巴金一个美丽的社会理想，而民粹派英雄则直接启发了巴金应该怎样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巴金非常赞赏民粹派们为革命事业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他创作中很自然地把这些形象构思进作品中去。巴金说过，他早期小说中的主人公杜大心和李冷，“只有一半的真实，其余的一半则是从书本（尤其是一些外革家的传记）里来的。”^①这个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巴金在一九二九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通过革命青年杜大心为反抗反动军阀的迫害，走上暗杀、牺牲道路的故事，寄托了作者对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白色恐怖的愤慨。这种创作基调，在巴金早期创作中一直保持着，《新生》与《爱情三部曲》等基本上可以说是《灭亡》的续篇。在这些小说中，巴金塑造了一批革命青年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不堪忍受反动统治者的迫害，由和平方式的反抗走向暴力反抗的过程。这一过程，同俄国民粹派的革命过程是非常相似的。民粹派的起先发起“到民间去”运动，深入农民中去宣传进步思想，后因沙皇的镇压迫使他们中断了这一宣传，于是走上了暗杀的恐怖活动。巴金写了杜大心为了给战友报仇去刺杀敌卫戍司令而牺牲，写了敏忍不住失败的痛苦去暗杀敌旅长而身死，这些形象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意党人的印记。巴金在谈《灭亡》的创作时曾说：“在《灭亡》里面斯捷普尼雅克的影响是突出的，虽然科茹霍夫和杜大心并不是一类的人”。《新生》中的李冷，曾公开表示要做一个象民意党人奈其亚叶夫那样的人，他在临刑时，坦然自若地说：“死是冠，是荆棘的冠，我必须戴这荆棘的冠”。这种精神状

① 巴金：《关于两个“三部曲”》，《抗战文艺》7卷2—3期合刊。

态与斯捷普尼雅克描写民意党人时的论述也是非常相似。^①

巴金笔下的青年恐怖主义者的思想感情，同另一位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的人物也有不少暗合之处。如果我们将《灭亡》同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放在一起读的话，就会发现杜大心的精神世界同绥惠略夫非常之接近。这两个人都是脱离人民群众的狂热的革命者，他们对群众中的愚昧的思想麻木感到绝望，转而去憎恨人类，绥惠略夫说：“我实在憎恶人类”。杜大心也说：“我只有憎，我憎恨一切的人”。两部作品中都贯穿着爱与憎的争论，杜大心同李冷兄妹围绕爱与恨的争论同绥惠略夫和亚拉籍夫的争论有相同的含义。他们最后都为社会所迫，走上了复仇的道路，而首先毁灭了自己。鲁迅关于绥惠略夫的一段分析：“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②也同样适用于对杜大心行为的解释。

阿尔志跋绥夫在后期是个反动的虚无主义作家，但他在早期曾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写过不少鼓吹反抗沙皇专制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也带有较浓厚的虚无色彩，但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都作为进步的作品，被我国进步文化界介绍翻译过。鲁迅首先译过他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等作品，并且指出：“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绥惠略夫）相象的”^③。茅盾当时还为鲁迅翻译的《工人绥惠略

① “宁愿抛了月桂冠去戴那荆棘冠，他们（指民意党人）便走向殉道的路上去了。他们恰如早年的基督教徒，以至诚博爱之心，严格的态度与温和的微笑走上了革命的祭坛，和断头台上的露水同消了”。（斯捷普尼雅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

② 《两地书·四》。

③ 《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夫》一书没有在社会上获得应有的重视而感到不平。一九二九年前后，阿尔志跋绥夫的名著《沙宁》在中国有三种译本出现，其中郑振铎的译本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影响最大。他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朝影》还被左翼作家钱杏村热烈地推崇过，钱杏村在《力底文艺》一书中，把《朝影》的主人公巴莎与屠格涅夫《前夜》中的英沙罗夫相比，并进一步呼吁：“中国现在需要的正是这样勇敢的超个人主义的革命家”。无可讳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进步作家的思想上存在着某些不成熟的因素，但他们对阿尔志跋绥夫的推崇是出于反抗当时黑暗的政治，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巴金的杜大心似乎正可以看作是这些左翼作家所期待的中国的“巴莎”，其在当时起到的进步作用，是无可怀疑的。

在描写青年人的爱情与婚姻方面，我们前面已说过，巴金把追求个性的解放、社会革命的思想联系起来的表达方式，不是来自于维特或娜拉，而是来自于民意党人的启发。斯捷普尼雅克在《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中论述过：“在虚无主义者看来，妇女解放底问题并不限于‘自由恋爱’之狭小的权利，因为若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没有变更，则所谓自由恋爱不过是自由选择主人的权利而已，重要的还是去追求自由本身”。巴金曾经翻译过一组反映俄国新女性的作品，其中有一篇是普利洛夫的《为了知识和自由的缘故》就是具体描写了俄国女青年如何利用“假婚”方式逃出家庭的藩篱，投入社会革命。这种“假婚”在中国没有尝试过，但俄国青年对于恋爱自由的理解，则在巴金作品中留下很深影响。过去有些人批评巴金的《家》中觉慧是个爱情至上者，这除了乱扣帽子外，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巴金的思想。高觉慧的出走，并不是因为爱情的失败，而是为了投入社会革命。另一个旁证就是《春》里淑英的出走，除了反抗包办婚姻外，更重要

的也是为了取得读书与做人的权利——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

在对待婚姻道德的观点上。巴金似乎是接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利他的个人主义”观点。他在《何为》的后记中说：“虚无主义虽已成为过去的陈迹，但它那利他的个人主义的精华依旧存在于那些现今激动着欧美前进青年的社会思想中，对于我们的青年也应该有点帮助”。这种“利他的个人主义”也包括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婚姻道德观。在《怎么办》中，罗普霍夫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同他的友人吉尔沙诺夫产生了真正的爱情，而他自己同妻子的性格却不很投合的时候，他假装自杀，悄悄退出了情场，让妻子同吉尔沙诺夫结合，享受真正的幸福。这种崭新的婚姻道德观，毫不掩饰地将爱情作为婚姻道德的基础，它不是把妇女作为男人的占有物，而是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这种婚姻道德观也不时地在巴金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他创作的许多男女恋爱故事中，妇女的地位始终跟男子平等的，爱情体现着男女双方对共同生活理想的追求。他唯一写到夫妇关系破裂的小说《寒夜》中，女主人公曾树生跟陈主任去兰州时，他的丈夫汪文宣尽管很难过，但仍没有把妻子视作私人的占有物，他承认她找到一条出路，并真心诚意地为了她的幸福同意她去兰州。汪文宣的形象，主要是一个压垮的知识分子形象，但在婚姻道德问题上，他身上还保留了这么一点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新人”的遗风。

在描写女青年对待爱情的态度以外，她们在对待事业的态度上，民意党人的影响在巴金作品中也是显著的。这除了索菲娅，妃格念尔等人的传记外，最典型的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作家用寓言的形式赞美了为革命献身的俄罗斯女革命家，诗中写到一个恐怖阴暗的建筑物的大门口站着一个姑娘，她迈进这个门槛，就意味着抛弃一切享乐甚至生命，为革命事业作出